



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 | 03

历史学家

[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著

凌建娥 刘玉红 译

ΤΟΜΟΥ ΜΟΝΑ
ΩΠΡΕΔΤΑΟ
ΒΕΧΕΤΒΑΝ

The Historian

Elizabeth Kostova

历史学家

The Historian

Elizabeth Kostova

[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著

凌建娥 刘玉红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5015

Elizabeth Kostova
The Historian

Copyright © 2005 by Elizabeth Kostov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in conjunction with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美)科斯托娃著;凌建娥,刘玉红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
ISBN 978-7-02-007706-9

I. 历… II. ①科…②凌…③刘…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5511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责任编辑:姚翠丽
装帧设计:董红红

历史学家

[美]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著
凌建娥 刘玉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03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5.5 插页 2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706-9
定价 34.00 元

出版说明

新世纪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方面依托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权威机构,每年一度评选世界各国优秀长篇小说,并将获奖作品集成“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出版;另一方面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高度关注世界各国最新出版的特色鲜明的优秀长篇,共同构成了新世纪人文版外国文学长篇小说翻译出版的豪华阵容。

这套“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的编辑设想则是在上述豪华阵容中以市场表现为主要依据进行遴选,充分体现我们对于广大读者阅读兴趣的尊重。列入“书架”的作品,内容生动,可读性强,一经问世,便畅销全球,深受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读者喜爱。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入选作品不仅风靡全球,其中不少还是世界各种文学大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之作,这表明了经典和畅销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统一体。

本丛书将分辑出版。第一辑共二十种,以本社初版时间为序编号排列,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代外国畅销小说的历史脉络。同时我们也希望这套丛书能以其既有的品质续写新的畅销奇迹,并有新作品源源不断地充实进来。在编辑遴选过程中,限于版权与视角诸原因,不周全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九年十月

献给我的父亲，
下面的故事
有些是
他最早告诉我的

致读者

我从未想过要将下面的故事诉诸笔端。可是,一股莫名的震撼近来总在促使我回首往事,回首我和我最爱的几个人生命中多灾多难的日子。这是一个寻亲的故事:十六岁的我追寻父亲和父亲的过去;父亲追寻他敬爱的导师和他导师自己的过去。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最终都站在一条无比黑暗的小路上,它通向历史。这也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谁死了,谁没死,为什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明白,追寻历史的人并非个个都可以幸存下来。而使我们陷入危险的并不仅仅是追寻历史,有时历史那朦胧的爪子也会朝我们无情地伸过来。

事情过去三十六年了。从那以来,我一直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我的时间都投入到研究工作和平淡无奇的旅行中。我要么和学生、朋友在一起,要么就是著书论史,这些书大多与个人情感无关;要么处理我所栖身的大学里的事情。多年来,与那段历史有关的大多数个人资料我一直保存着,能够接触到这些资料,我真是幸运。我在合适的地方把它们穿插进去,确保故事流畅,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回忆作一些必要的补充。尽管我在这里只是重述父亲最初讲给我听的故事,我还是大量利用了他的信件,其中一些信的内容和他的口述是一样的。

除了几乎原封不动地引用这些材料外,我还尽可能地去回忆,去寻找,有时旧地重游,让我记忆中褪色的部分重新鲜活起来。这项工作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采

访——有时是书信联系——采访那些故事中提到的仍然健在的学者们。他们的回忆给我补充了非常宝贵的材料。此外,我的文本最终还得益于与好几个领域的一些年轻学者的交流。

必要的时候,我还求助于想象,这是我最后的办法。我在运用想象的时候极为小心谨慎。只有我确认是非常可能的,而且只在这种可靠的推测使我的资料与其背景相吻合时,我才为我的读者发挥想象。对于那些我无法解释的事情或动机,我尊重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事实,绝不妄自揣度。对于故事中更为久远的历史,我都尽可能仔细地研究过,其认真程度不亚于我研究任何学术论著。故事中提到的东方的伊斯兰教和西方的犹太—基督教所发生的宗教和领土冲突应该是现代读者既熟悉又感到痛苦的。

这项工作得以完成,我得到过很多朋友的帮助,我对他们的谢意无以言表,不过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下面几位。他们是:布加勒斯特大学考古博物馆的拉都·杰奥尔杰斯库博士、保加利亚科学院的伊凡卡·拉扎洛瓦博士、密歇根大学的彼塔·斯托伊切夫博士、大不列颠图书馆孜孜不倦的工作人员、拉瑟福特文献博物馆和费城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位于圣山的佐格拉福修道院的瓦索神父以及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图尔古特·博拉博士。

我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发现至少有一位读者能明白它真正的意义: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喊。敏锐的读者,我把我的历史传给您了。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五日,于英国牛津大学

第一部

这些篇章之所以如此排列,其中的奥妙
读者在阅读中自会明白。所有无关的事件
一概排除在外,这样一种与后人看法迥异的历史
能脱颖而出,它只是简单的事实。
这里不存在记忆会有纰漏的问题,
因为所有精心挑选的材料都是当代的,
由那些创造历史
并了解历史的人们亲口讲述。

——布拉姆·斯托克,《德拉库拉》,一八九七年

1

一九七二年，我十六岁。父亲说我还不够大，不能和他一同去旅行，他是要去执行外交使命的。他更喜欢我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学校里好好读书。当时，他的基金会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儿就是我的家，以至于我几乎都忘了小时候在美国生活过。我一直都是个听话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很久还是如此。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我的同龄人都在体验吸毒和反越战呢。可我一直是在备受呵护的环境里长大的，因此成年后在学术界的生活成了恰到好处的冒险。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是个没妈的孩子，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对我加倍关爱。我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当时我父亲的“和平与民主基金会”还没有成立。父亲从来不提母亲，即使我问起，他也总是转过头去，缄默不语。于是我很小就明白了，这对于父亲是一个太痛苦的话题，他无法开口。他只是一味地给我精心的爱护，给我请一连串的家庭教师和管家——在事关我的教育问题上，他从不吝啬，尽管我们过着简朴的生活。

克莱太太是这些管家中的最后一位。她负责照看我们位于老城中心拉姆格拉希特运河边上的住宅。房子不是很大，是十七世纪的建筑。每天我放学回来，克莱太太都给我开门，父亲常不在家，这时她就算是我的家长了。她是英国人，年纪比我母亲要大，如果母亲还活着的话。克莱太太用起鸡毛掸子来可谓得心应手，可教育青少年就显得笨手笨脚了。有时，我看着餐桌对面她那张充满同情、长着龅牙的脸，我觉得她肯定又想起了我母亲，我真讨厌她那样。父亲不在家的时候，那座漂亮的房子空荡荡的。没人教我做代数题，没人对我的新大衣赞不绝口，没人叫我走过去拥抱他一下，也没人大惊小怪地说我竟然长这么高了。每当父亲从挂在餐厅墙上的那幅地图上的某处回来时，他浑身上下都散发出异国他乡的味道，兴致高昂，但疲惫不堪。我们总是在巴黎或罗马度假，孜孜不倦地研究那些我父亲认为我应该了解的名胜古迹。然而我最想去的还是他一个人去过的那些地方，那些我从来没有去过的

稀奇古怪的地方。

每次他不在家，我的生活就是学校和家这两点一线。放学回家，我砰地把书包扔到擦得锃亮的门厅桌上。克莱太太和父亲都禁止我晚上外出，只是偶尔和经他们严格审查后认可的朋友们一起去看一场经过他们严格审查后认可的电影。这些规矩我竟然一直老老实实在地遵守着，现在想起来真是匪夷所思。不过，我喜欢孤独，我是在孤独的环境里长大的，在孤独中我如鱼得水。我学业上出类拔萃，但在社交方面就相形见绌了。和我同龄的女孩让我感到害怕，特别是外交圈里那些满口粗话、烟瘾极大而自以为成熟的女孩。和她们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的裙子不是太长就是太短，或者我根本就不应该穿裙子。尽管我会模模糊糊地梦见异性，男孩还是让我感到神秘莫测。事实上，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独自待在一楼我父亲那间宽敞、雅致的书房里的时候。

书房从前很可能是客厅，但他从来都是在那里看书。他认为一间宽敞的书房比一间宽敞的客厅更重要。他很早就让我随意浏览他的藏书。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会几小时几小时地在他的红木书桌上做功课，或者浏览四周沿墙书架上的书。我后来推测父亲也许是忘了书架顶层上的东西，或者，更可能以为我还够不着那些东西。总之那天晚间，我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古印度《爱经》的译本，同时还有一本更旧的书和一袋发黄的文件。

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明白那天我是怎么就把它拿了下来，而且还被深深地吸引住的：书中央的插图散发出那种古老的味道，我还发现那些发黄的文件都是私人信件。我知道我不应该翻看父亲或者任何人的私人文件，我担心克莱太太随时都会来给一尘不染的书桌掸拭灰尘，我回头看了看门口。但我还是站在书架旁，情不自禁地读起了最上面一封信的第一段，几分钟而已。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不管您是谁，想到您在读我不得不留下的信，我非常遗憾。我为自己感到遗憾——如果这信到了您手里，必定是我有了麻烦，也许是死了，或者更糟。但我也为您感到遗憾，我未曾谋面的朋友。因为一旦您读到这封信，必定是有人需要这个邪恶的信息。如果您在其他意义上不是我的继承者，您也很快成为我的继承者——把我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经历移交给您，我真的很难过。这邪恶我是如何继承下

来的,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最终能找到真相——也许是在给您写信的过程中,也许在以后的事态发展过程中。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我读到这里,内疚——以及其他的原因——促使我赶快把信放回了信封。但那天和后来很多天我一直在苦苦寻思那封信。我父亲结束了又一次外交旅行,回到家,我一直想找个机会问问他那些信,还有那本奇怪的书。我想等他有空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人时才开口,可那些天他一直在忙,而且我发现的东西有些离奇,我犹豫着要不要跟他说。后来,我问他下次出门能不能带上我,这是我第一次对他保守秘密,也是我第一次坚持自己的主张。

父亲勉强答应了。他和我的老师以及克莱太太都谈了话,提醒我在他开会的时候我会有充裕的时间做功课。对此我毫不怀疑。外交官的孩子总是要等待。我收拾好我的那个藏青色旅行箱,带上课本和很多双干净的齐膝袜子。于是,那天早上我没有去学校,而是默不作声但非常愉快地跟着父亲向车站走去。我们坐火车到维也纳。父亲讨厌飞机,他说坐飞机旅行就不像旅行了。我们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匆匆歇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坐火车进入阿尔卑斯山脉,沿途经过我们家地图上所有那些用白色和蓝色标注过的高地。我们到了一个黄尘满地的车站,父亲发动了我们租来的汽车。我屏住呼吸,直到车子转弯进入城门。这座城市他已经和我描述了很多次,我在梦里都可以看见它。

秋天总会提前降临斯洛文尼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还没到九月,丰收季节刚过,一场令人不堪的雨就会突降,一下好几天,把树叶打落在村里的小道上。现在,我五十多岁了,每隔几年还会去那里走走,回味一下我第一次看见的斯洛文尼亚的田园风光。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每个秋天都会让它愈加甘美,每个秋天都是三种颜色的景象:绿色的风景,两三片黄色的落叶飘落在灰色的午后。我想,当年罗马人——他们的古城墙还在,西部海岸的竞技场遗址犹存——看到的秋天也莫不如此,而他们也一定同样的激动。当父亲的车驶过古罗马城最古老的城门时,我情不自禁地抱紧了自己。平生第一次,我作为一个旅行者,看到了历史那深奥的面孔,巨大的激动把我攫住了。

因为我的故事是从这座城市开始的，我要叫它埃莫娜，这是它的罗马名字。这样我可以给它一点儿保护，让它免受那些拿着导游手册，到处寻找废墟的游客的糟蹋。埃莫娜建于铜器时代，位于沿河一带，现在那里一路过去都是新艺术主义风格的建筑。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里，我们将漫步经过市长官邸，经过十七世纪饰有法国王室银色纹章的城内住宅，经过一座集市大楼坚实的金色后墙，大楼的台阶一路往下，从栅栏严密把守的老门通向河面。几百年以来，货船停泊在这个地方，给城里送来给养。当年，古朴的茅屋在河岸四处扩散；现在，小无花果树——欧洲的一种悬铃木——长成密密的一带，高过河边护墙，片片卷曲的树皮掉落到湍流里。

集市附近，阴沉的天空下，是城市的主广场。埃莫娜和它以南的其他类似城市一样，拥有复杂的历史：地平线尽头是维也纳风格的艺术装饰，高大的红色教堂是文艺复兴时期讲斯拉夫语的天主教徒建起的，拱形的褐色中世纪礼拜堂的外貌富于英伦三岛的情调。（圣帕特里克曾派传教士到这个地区，新的教义因此完全回溯到它的地中海源头，这座城市也就成了基督教在欧洲最古老的史迹之一。）这里的门口、那里的尖形窗框不时凸现出土耳其的民族风格。集市隔壁是一个奥地利式小教堂，它敲响晚弥撒的钟声。身穿蓝色工作服的男男女女们下班回家，撑着雨伞，遮着包。我和父亲驾车进入埃莫娜市中心，途中经过一座精致的老桥，桥两端有发绿的铜龙把守。

“那就是城堡，”我父亲说着，在广场边放慢车速，朝上指了指雨帘，“我知道你想去看看。”

我的确想去。我拼命伸长脖子，终于透过湿漉漉的树枝看到了城堡——破旧的褐色塔楼，矗立在城中央一座陡峭的小山上。

“十四世纪，”我父亲沉思道，“还是十三世纪？对这些中世纪的遗迹我不太了解，不知道它们具体属于哪个世纪。不过我们可以查查导游手册。”

“我们可不可以走上去，到处看看？”

“等我明天开完了会，我们就能搞清楚。那些塔楼看上去摇摇欲坠，不过谁知道呢。”

他把车开进市政厅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颇有绅士风度地扶我下了车，他皮手套里的手瘦骨嶙峋。“住店还早了些。你想不想来杯热茶？要不我们也可以去那家食品店去弄点快餐。雨下得更大了。”他犹豫不决地加了一句，看了看我的羊毛上衣和

裙子。我赶紧拿出他前年从英国给我带回来的带帽子的雨披。从维也纳坐了近一天的火车，尽管在车上吃过午饭，我还是饿了。

不过，吸引我们的不是在食品店那扇灰暗的窗户里闪烁的红蓝灯火，不是穿着藏青色厚底便鞋的女招待——当然不是——也不是铁托同志那幅表情阴沉的肖像。我们小心翼翼地挤过湿漉漉的人群，我父亲突然急奔向前。“这儿！”我跟着跑，雨披展飞，差点儿挡住我的视线。他找到了一家新艺术风格的茶馆。一扇带涡卷装饰的大窗，绘的是鸛鸟涉水，铜门的形状是一百枝水百合的茎干。门在我们身后重重地关上，雨水淡成窗上的一片薄雾，窗上的水蒸气，透过银色的鸛鸟看出去，是一片模糊的水花。“三十年过去了它还在，真是不可思议，”父亲正脱下他在伦敦买的手套，“对自己的财富，这里的人们可不总是那么珍惜的。”

我们坐在临窗的桌旁，喝着柠檬茶，杯子很厚，茶水还很烫人，慢慢就着涂了白色奶油的面包吃沙丁鱼，还吃了几片果子奶油蛋糕。“我们就吃到这儿吧，”我父亲说。近来我开始不喜欢他一遍遍吹凉茶水的样子，害怕他说我们就吃到这儿吧。你正吃在兴头上，他却叫你停下来，留着肚子吃晚饭。我看了看他整洁的斜纹软呢短外套和套领毛衣。除了外交活动，他已经拒绝了生活中的一切冒险。外交把他给毁了。我想，他要是能多点儿生活趣味，本来会过得更快乐的。对他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正儿八经。

不过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讨厌我唱反调，而且我有事要问他。我得让他先喝完他的茶，于是我往后靠到椅子上，但不是靠得太后，免得父亲说我不注意坐姿。银色的窗外是一个湿淋淋的城市，随着晚上的临近而显得阴暗起来。人们在迎头大雨中匆匆而过。茶馆平时挤满了人，女士们穿着乳白色的薄纱长礼服，留着小胡子的绅士们则穿绒大衣，可今天冷冷清清的。

“没想到开车会这么累，”我父亲放下杯子，指着在雨中勉强看得见的城堡，“我们就是从那里来的，山的另一边。在山顶上可以望得见阿尔卑斯山。”

我记得山坡上白雪皑皑，群山似乎就在这座城市上空呼吸。现在，在山的远侧，只有我俩在一起。我迟疑着，吸了一口气：“可以给我讲个故事吗？”对我这个没妈的孩子，讲故事是父亲安慰我的常用招数之一，有时讲他自己在波士顿度过的快乐童年，有时讲他那些更具异国情调的旅行，有时他自己现编现讲，不过近来我听烦了，这些故事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引人入胜。

“讲阿尔卑斯山的故事？”

“不，”我心头涌上一阵莫名的恐惧感，“我找到了一些东西，想问问您。”他转过身来，扬起他灰色眼睛上泛灰的眉毛，温和地看着我。

“在您的书房里，”我说，“对不起——我到处乱翻，发现了一些信件和一本书。我没看——没怎么看——那些信。我以为——”

“一本书？”他漫不经心地问道，口气依然温和。他只看着杯子，要喝完最后一滴茶水。

“它们看上去——那本书很旧，中间印有一条龙。”

他俯身向前，静静地坐着，然后颤抖起来。这个古怪的动作使我立刻警觉起来。如果他真要给我讲个故事，这个故事会和以往的截然不同。他低着头瞟了我一眼，看上去那么憔悴，那么悲伤，我吃了一惊。

“您生气了吗？”我现在也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茶杯。

“没有，亲爱的，”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似乎悲伤哽住了他。金发的小个子女招待给我们添满水，走开了，他依然很难开口。

2

你是知道的，我父亲说，在你出生前我是美国一所大学里的教授。在成为教授之前，我当了多年的学生。起初我想学文学。后来，我意识到我还是更喜欢真实的故事，而不是想象的那种。我读过的文学故事都将我带入对历史的探索。于是，我最终选择了历史。你似乎也喜欢历史，我很高兴。

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一个春天的晚上，我独自坐在学校图书馆里一个小单间里自习，很晚了，周围都是一架架的书。突然，我意识到有人在我的课本中夹放了一本书，那书脊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的课本就在我课桌上方的架子上。这本新书的书脊上印了一条优雅的小龙，在浅色的皮面上显得绿绿的。

我记得无论在眼前的书架上或在任何其他地方,我都没见过这本书。我不假思索地拿了下來看个究竟。书是软皮装订的,褪了色的皮子,里面的书页看上去显得非常陈旧。我随便一翻就翻到了书的中间,一条木刻的巨龙横亘在左右两页纸上,它伸展双翅,长尾巴弯成圈,凶神恶煞,张牙舞爪,爪子上还挂着一面旗,上面只有一个名字,是哥特字体:德拉库拉。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名字,尽管我没读过布拉姆·斯托克的同名小说,我还是想到了它,也想起了儿时在不远的电影院流连的那些夜晚:贝拉·路格斯(即德拉库拉)盘旋在某个初出道的女演员白皙的脖子上。但名字的拼写有些怪异,书看上去也很旧了。此外,我是一名学者,对欧洲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盯着那个名字,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些资料。德拉库拉这名字其实是来自于拉丁词根,意思是“龙”或“魔鬼”,这是瓦拉几亚^①弗拉德·特彼斯——“穿刺者”——的荣誉称号。他是喀尔巴阡山脉一片领地的统治者,以酷刑虐待其臣民和战俘而著称。我当时在研读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贸易,实在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一本书夹在我的书里。我想是有人不小心放在这里忘了拿走,这人也许正在研究中欧历史或封建时期的象征符号。

我随手翻完书的其他部分——如果你整天都和书打交道,每一本新书都像是一个朋友,一个诱惑。更让我吃惊的是,那些象牙色的薄纸竟然都是空白的。整本书连扉页都没有,当然更没有出版时间和地点,没有地图,没有卷首或卷尾的空页,或任何其他的插图,也没有学校图书馆的盖章,没有目录卡或任何其他的标记。

我又看了几分钟,把它放在桌上,到一楼的图书分类处,那里的确有一张主题卡,“瓦拉几亚的弗拉德三世(特彼斯),1431—1476年——参阅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②和德拉库拉”。我想,我应该先看看地图。很快,我发现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是两个古老的地方,位于今天的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看上去是个多山的地区,而瓦拉几亚在西南方与它接壤。在一堆图书目录卡中,我发现了似乎是图书馆里关于此题材的惟一的第一手资料,那是一本奇怪的英文小书,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某些关于吸血鬼德拉库拉的小册子翻译过来的。原文是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和

① 瓦拉几亚,罗马尼亚东南部一历史地域,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山脉和多瑙河之间。

② 特兰西瓦尼亚,历史上罗马尼亚西部的一个地区,以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为边界。

八十年代在纽伦堡出版的。这里提到了纽伦堡，我心中一凉。就在几年前，我在那里密切跟踪过对纳粹首领的审判。战争结束前，我小了一岁，没当兵，没能参加战争，我便满怀热情地开始研究战争的影响。这本小册子的标题页有一幅粗糙的木刻画，那是一个男人的头和肩，一个粗颈男人，浓眉笼罩着一双黑眼睛，长长的胡子，戴着一顶插有羽毛的帽子。尽管制作技术原始，整幅画依然栩栩如生。

我知道我该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我忍不住，还是开始阅读其中一个小册子的开头，里面列出德拉库拉对他的臣民和其他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我可以根据回忆复述出我读到的内容，但我想还是不要——太让人不安了。我啪地合上小书，回到自己的小单间里十七世纪令我着迷，我一直读到半夜。我把那本怪书放在我的桌上，希望它的主人第二天会找到它，然后就回去睡了。

第二天上午我有课。晚上熬得晚，人也觉得累。下了课，我喝了两杯咖啡才又到图书馆继续我的研究。那本古书还在我桌上，只是它现在翻到了巨龙盘旋的那一页。我只睡了一会儿，午饭吃的也不像样，只喝了咖啡，看到它，我像从前小说里说的那样，吃了一惊。我又翻了一下那本书，这回仔细得多。中间这条龙毫无疑问是木刻的，也许是中世纪的风格，书做得很不错。我想它很值钱，同时对某个学者而言也许还具有重要的个人价值，因为它显然不是图书馆的书。

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喜欢书的样子。我有点儿不耐烦地把书合上，开始写我的关于商人行会的论文，一直到下午早些时候。离开图书馆时，我去前台把书交给图书管理员。那人答应把书放到失物招领柜。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拖拖拉拉地到了图书馆，打算再写一写论文的那一章。那本书还在我桌上，敞开它那惟一而冷酷的插图。我有些恼火——管理员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匆匆把书放到架子上，干起自己的事情来，一整天都不让自己去理会它。下午早些时候，我要和导师见面。我在收拾自己的论文时，把那本怪书拿出来，和文章放在一起。一时冲动吧。我并没有想要这本书，但罗西教授喜欢神秘的历史，我想他也许会喜欢这本书。他对欧洲历史无所不知，也许可以对它说出个究竟来。

我通常在罗西教授上完下午的课后去见他，而且我还喜欢在下课之前就溜进教室，看他上课。这学期他讲的是古代地中海。我有幸目睹他好几次课的结尾部分，每一次都是那么精彩，那么生动，无不洋溢着雄辩的天赋。这次我又溜到后面的